

從「富家公子」到民族運動「啟蒙先驅」 ——蔡惠如生平與作品新論

廖振富

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摘要

蔡惠如（1881-1929），為日治時期台灣政治運動之重要參與者，對日治時期新舊文學之發展，也有相當的貢獻。然而資料匱乏，不論在台灣文學或史學領域，關於蔡惠如的研究成果都相當有限，且仍有諸多不足或錯誤。本文利用近年新發現的史料，修正先前的錯誤描述，進而重新討論其生平事蹟與作品意涵，建構較為清晰的蔡惠如生命圖像。資料來源包括：田野調查所得之原始文獻、日治時期報紙雜誌、近代相關人物日記等。在說明資料來源及其價值之後，正文內容涵蓋「生平考察」與「文學活動與創作」兩大部分，前者分成兩節，詳細勾勒他從早年經商生涯，到中年投入民族運動的轉變歷程。後者則從文學角度，討論其文學活動與作品的思想意涵，其寫作文類涵蓋古典詩詞與白話散文體，正是1920年代台灣新文學萌芽時期的特殊現象，而結合前文關於其生平事跡的考察，將有助於理解：蔡惠如為何從傳統漢文化的捍衛者，蛻變為傳播新時代啟蒙思想的先驅人物。透過蔡惠如的個案，也可以為日治時期新、舊世代知識分子的文學表現與思想傳承之相關研究，提供另一鮮明例證。並修正日治時期「台灣新、舊文學」二元對立的論述模式。

正文之後，並有附錄「蔡惠如相關原始史料：櫟社題名錄、照片與相關書信」，來源多為傅錫祺家屬提供。

關鍵詞：蔡惠如、櫟社、台灣文社、台灣民族運動、《臺灣民報》

From Playboy to Nationalist:

Tsai Hui-ru's Life and Works

Liao Chen-Fu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Transnational Cultural Studie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sai Hui-ru (1881-1929)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olitical activists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in Taiwan. However, current research of his life and works is very limited and insufficient with misunderstandings. This paper tries to decipher Tsai's life picture and modify the misunderstandings by using newly-found materials, which include original data collected from fieldwork,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from the colonial period, and dairies from relevant figures. This paper consists of two parts: his personal life, and his activities and writings in literature. The first part draws attentions to the process in which he starts his early life as a businessman and later devotes himself to the Taiwanese nationalist movement. By looking into his literary activities and works with reference to his personal life, the second part hopes to understand the way in which Tsai becomes an intellectual pioneer who advocates the importance of enlightenment from a defender of traditional Han culture. This case study on Tsai may provide an example of looking 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llectuals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age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This paper is followed by an appendix under the title of "Newly-found Materials of Tsai Hui-ru: the Li Society, Pictures and Letters."

Keywords: Tsai Hui-ru, the Li Society, Taiwan Literature Society, Taiwan Nationalist Movement, The Taiwan Minpao

從「富家公子」到民族運動「啟蒙先驅」

——蔡惠如生平與作品新論

一、前言

蔡惠如（1881-1929）在日治時期台灣政治運動及文學史料中，是常被提及的名字，但由於資料不足，他的生平事蹟只片段出現於台灣政治運動之相關著述，並未見專門研究，而唯一的一本傳記《啟門人——蔡惠如傳》，¹運用資料相當有限，而寫作又近似小說筆法，參考價值不高。由於資料不足，關於其人生平事蹟及歷史定位的完整研究，在當前學界仍非常欠缺。學界對蔡惠如的認識，大致不外如下資訊：他出身台中清水望族，在1906年曾加入傳統詩社樂社，1918年倡議組織全島性的漢文研究機構「台灣文社」，大力鼓吹漢文。另一方面，他也是日治時期台灣政治啟蒙運動之重要領導人之一，1920年在日本組織啟發會，捐鉅款給台灣留日青年，促成《台灣青年》創刊，論日治時期台灣民族運動，他是不可忽視的重要領導人等等，至於更詳細的資訊或瞭解，則付諸闕如。

近年隨著台灣本土意識的抬頭，蔡惠如研究逐漸受到重視。關於其文學創作，筆者在2002年4月曾發表專文〈日治時期臺灣「監獄文學」探析——以林幼春、蔡惠如、蔣渭水「治警事件」相關作品為例〉，該文雖是林幼春、蔡惠如、蔣渭水三人入獄作品之綜合研究，卻是學界首篇深入探討蔡惠如文學作品的論文，並認為詞優於詩。²接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在職專班的林佳蕙，在2004年6月以〈日治時期臺灣「監獄文學」探析——以林幼春、蔡惠如、楊

1 該書由小說家白慈飄撰寫，內容只著重在1920年代蔡惠如投入民族運動的經過，資料主要取材自《臺灣民報》關於「治警事件」及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相關報導。該書是中國國民黨關係機構「近代中國出版社」於1977年出版。

2 該文原收錄於東海大學中文系主編，《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學論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2003.02），頁136-201。其後又被收入以下三書（1）許俊雅主編，《台灣古典文學評論合集》（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4.11），頁485-555。（2）謝金蓉編，《蔡惠如和他的時代》（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06），頁121-190。（3）廖振富，《台灣古典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晚清到二二八》（台北：國立編譯館，2007.07），頁93-160。

華作品為例〉為題完成碩士論文，該文之題目、架構、內容，皆明顯受到筆者前文之影響，進行更全面性的討論。2009年1月台灣師範大學台文所研究生許薰文完成學位論文〈日治時期櫟社四家詞析論——林癡仙、陳貫、陳懷澄、蔡惠如〉，其中第六章則專論蔡惠如的詞作。以上三篇論述，都是綜合數家為研究對象。

在專書方面，台灣大學2005年6月出版由謝金蓉主編的《蔡惠如和他的時代》，是蒐集蔡惠如生平與作品資料及相關研究論述之第一本著作。全書開頭有謝金蓉專文〈緣起：第一個走向東亞的台灣人〉，內容涵蓋「家傳影像」、「蔡惠如作品彙編」、「詩友筆下的蔡惠如」、「哀悼詩文與祭辭」等幾個部分，及謝金蓉、廖振富、陳柔縉的三篇相關文章。該書運用不少家藏的照片，提供生動的影像，是一大特色，³至於三篇文章，筆者專文即前述之〈日治時期台灣「監獄文學」探析——以林幼春、蔡惠如、蔣渭水「治警事件」相關作品為例〉一文，而謝金蓉所撰寫的〈生平導論——從清水走向民族運動的舞台〉，透過田調與史料蒐集，詳論蔡惠如的家族出身與成長背景、社會活動，論述重心仍在詳述他參與投入政治運動的經過，乃至去世前後的悲涼晚景，文字極有感染力，可讀性高。陳柔縉文章〈日治中期台灣人在東京的政治運動身影〉，作者赴東京實際調查當時台灣民族運動的參與者活動的景點，提供相關空間背景的理解。由於這是第一本蔡惠如的專書，出版後曾引起學界相當的矚目與迴響，可惜出版當時受限於諸多條件之不足，導致此書在資料蒐集上缺漏、錯誤頗多，品質未臻完善。⁴

筆者多年來持續關注台灣傳統文人與政治啟蒙運動者之互動關連，並集中心力於台灣中部櫟社文人社群研究。近年來，筆者陸續從田野調查獲得數量非常龐大的資料，深感振奮。另外，日治時期各類報紙雜誌之複印本，或電子資料庫之陸續出版建置，使用便利，更提供不少新的研究素材。有鑑於此，筆者

3 謝金蓉女士的婆婆（其夫郭宏治之母）蔡紫蘭，是蔡惠如三子蔡珍曜的女兒，也就是蔡惠如的孫女，因此擁有不少珍貴的家族照片。

4 受限於當時條件不足，所收作品的來源有限，如《臺灣日日新報》當時並無電子資料庫，編者未從中蒐集。再者，本書收錄作品因手稿辨認之誤或校對不精導致的錯字極多，甚至誤收不是蔡惠如的作品。

認為利用上述學術資源，針對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人社群之思想與作品，展開更細密研究的時機已經成熟，其中蔡惠如便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個案。

1929年5月20日蔡惠如去世之後，他的好友兼同志林幼春寫的輓聯，很能彰顯生命情調，內容如下。

千金脫手，杯酒定交；憶當年遊俠，駿馬胡姬傾海市。

萬里歸來，一丘高寤；歎英雄末路，啼猿怨鶴滿空山。⁵

上聯是寫蔡惠如的浪漫、慷慨與豪氣，稱之為「遊俠」，下聯則寫蔡惠如腦溢血突發，從福州回到台灣醫病，不久便撒手人寰，並以「英雄末路」感嘆他壯年猝然辭世，徒留無限憾恨在人間。而林幼春在代表櫟社所寫的〈蔡鐵生哀辭〉祭文中，更進而凸顯他奉獻於抗日民族運動的貢獻，稱之為「海國奇鷹」，可說是最能反映蔡惠如人格特質之佳作：

嗟我鐵生，鐵中錚錚。匪羽群之凡鳥，實海國之奇鷹。當盛年而氣銳，逐貨殖於奇贏。奮十萬之一擲，乃棄家而遠行。迨中歲之奔馳，期勵志以立名。友太學之林宗，識酒人之慶卿。哭迷路之兩歧，哀腐草之群生。連父老以請命，謁朝野而通誠。遂置名於鈞黨，繫縲絏而逾榮。雖半途之遽殞，寧沒世而無稱。⁶

林幼春與蔡惠如既是櫟社詩友，又是為共同理想而一起入獄的同志，兩人服刑

5 這副輓聯，收入蔡培火，《家世生平與交友》所收之「蔡培火日記」，頁95-96，張炎憲總編輯，《蔡培火全集》（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0.12）。不過該書收錄這副對聯時，標點錯誤，造成文意難以理解，筆者已重新加以標點。日記中記載：蔡培火相當讚賞這副6月1日曾掛在喪禮會場的輓聯，林幼春則對蔡培火說：因為與惠如相處甚久，瞭解很深，才能寫得那麼恰當。

6 見林幼春，《南強詩集，南強文錄》（台中：中台印刷廠，1964.02），頁11。根據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八）》1929年6月9日記載，頁57-58：本文曾發表於報紙（推測為《臺灣新聞》），並署名「櫟社代表者傅錫祺」，張麗俊將全文抄錄在他的日記中，正文之前另有以下文字：「社友蔡君鐵生，以中風之疾，歸自閩疆，五月二日卒於台北中村醫院，翌日歸櫟於清水故居，定於六月一日葬於鰲峰山麓，同人聞赴乃哭諸其堂，吊其子，復為文以抒其哀。其辭曰……」不過中研院台史所出版的《水竹居主人日記》對該文的標點斷句，有多處錯誤，本書已重新斷句。又根據傅錫祺日記，可知哀辭是出自林幼春的手筆。

前後藉唱和相互砥礪之詩詞甚多，充滿惺惺相惜的革命情誼。上述輓聯及祭文，以相當感性的語氣概括了蔡惠如短暫的而充滿傳奇色彩的一生。

由於蔡惠如之相關資料有限，過去他被記載的事蹟與作品，僅集中於政治運動領域及治警事件之片段，因此他的身影對當代入仍是相當模糊的。有鑑於此，本文將廣泛蒐集各類珍貴史料（詳見下文），針對蔡惠如生平事蹟：包括經商生涯、政治活動、文學活動及創作情形等議題加以考察，以便對其事蹟與個性更清晰周全的掌握。全文之後，筆者並根據各種新發現的資料，製成「蔡惠如年表初編」，希望有助於後人重新認識蔡惠如，以及他在近代台灣史上的特殊意義，同時訂正相關記載之錯誤。

二、蔡惠如新資料的來源與價值

（一）資料來源分類簡述

本文在《蔡惠如和他的時代》一書的基礎之上，有不少全新的斬獲，可提供不少新論點與新發現，新資料大致包括以下幾大類。

1. 田野調查所得之原始文獻

筆者根據櫟社社長傅錫祺後人所提供之大量書信及其他文獻，發現其中有多件蔡惠如書信、及作品手稿。包括赴日本寫於船上的信（約1910年代），以及1924年因參加「無力者大會」意外跌斷腿骨受傷，答謝傅錫祺慰問之唱和詞作等。這類資料是從未公開的珍貴文獻，可欣賞蔡惠如以毛筆寫成的秀麗書法，亦可理解其個性為人，其價值不言可喻。

2. 日治時期報紙雜誌

以《臺灣日日新報》電子資料庫，及其他報紙雜誌複印本為主。利用《臺灣日日新報》電子資料庫，可找到不少蔡惠如之生平資料，以及詩詞作品。生平資料涵蓋其社會活動、經濟活動、文化活動、政治運動等，如1909年有蔡惠如在台中成立米穀公司之報導，1911年有蔡惠如與連橫同時在台中斷髮之報導，1916年有其原本經商失敗、多年行蹤不明，因逢父喪而返台奔喪之報導，1920年代有刻意醜化他投入台灣議會請願運動是受人攪動之報導等，這些資料

可對蔡惠如生平事蹟增加不少瞭解。至於作品，早在1905年便有與後藤新平唱和詩作〈謹步鳥松閣瑤韻〉，1916年有〈頓狂詩〉之作，1924年有詞作〈貂裘換酒（送蔡伯毅老弟辭官西渡）〉等多首作品，皆前人所未見。另外，《臺灣民報》上有署名「澈心」〈遊日月潭〉詞作兩首，筆者根據其書信與其他資料，確認「澈心」是蔡惠如之筆名，此乃一大發現，對蔡惠如研究提供不少新作品與新線索，其他有待蒐集、整理者仍不少。

3. 近代相關人物日記

包括已出版之日記與未出版的日記各三種，合計六種：已出版者有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蔡培火日記，⁷未出版者則有櫟社發起人林癡仙的日記，⁸正在整理中的「傅錫祺日記」，⁹以及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正在解讀中的「黃旺成日記」¹⁰等。「林癡仙日記」記錄蔡惠如早年在台中的活動，及1914年兩人為同化會赴日本的經過。根據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可看出，林獻堂、蔡惠如兩人私交似乎不甚融洽，甚至曾有過節。而1929年的蔡培火日記，對蔡惠如有頗多負面評價、貶抑之詞，提供我們觀察研究的另一個側面。凡此皆有助於更全面的理解當時知識分子彼此之互動，與思想個性之差異，並避免將研究對象過度推崇、美化。¹¹

（二）新資料的參考價值

透過上述新資料的挖掘整理，往往能提供更多發現，從而跳脫將人物事蹟

7 蔡培火日記，由於保存年度不多並未獨立成冊出版，收入《蔡培火全集·第一冊·生平家世與交遊》。

8 筆者所見之「林癡仙日記」，涵蓋年代約1906-1915年，藏於家中，原為其子林陳琅先生保存。筆者撰寫博士論文時曾向林陳琅先生借閱參考。目前由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許雪姬教授保存，台灣師範大學歷史所博士李毓嵐曾與筆者交換、分享日記內容，並經整理打字後提供筆者參考，特此敬表謝意。

9 「傅錫祺日記」共35冊，由傅錫祺家屬保管，筆者獲得家屬支持合作與國科會經費支持，正在積極整理中。

10 「黃旺成日記」，目前正由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許雪姬所長帶領的日記解讀班進行解讀。迄2010年12月為止，《黃旺成先生日記》已出版第1-7冊，時間是1912-1919年。筆者在2011年2-7月擔任該所訪問學人間，有幸參與「黃旺成日記解讀班」，因而獲睹尚未出版的1923年日記原件及影印本，對主持人許雪姬所長及全體解讀班成員的努力，敬表謝意。

11 過去筆者以為蔡惠如投入巨大心力在民族運動並慷慨解囊，是造成他經濟狀況加速惡化的原因之一，但就新發現的史料推斷，他在台灣、中國等地的商場表現，似乎有多次起伏與經營失敗的紀錄，他晚年的潦倒應該是與他的個性不善經營有關，並非是對民族運動慷慨解囊所致。

行蹤及其思想，作過於簡單化、概念化刻板定位的常見窠臼，而能更深刻細緻考察其思想的曲折演變軌跡。以蔡惠如為例，作為台灣地方望族之子，他並非一開始便具有鮮明的政治立場與清晰的理念，甚至可以說：其生活形態早年並未脫離「富家公子」的習氣，常出入風月場所，以文酒風流自命，並與日本官方保持一定的友善關係。直到1915年之後，對政治運動參與、介入愈多，對世界思潮瞭解加深，他才逐漸展現其思想的轉變脈絡。1920年代，他在日本與台灣留日青年互動頻繁，因緣際會，乃一躍而為當時台灣政治運動的領導菁英之一，其作品之思辨性愈趨清晰深刻。

不過即使有這些新發現，由於蔡惠如常往來日本、中國等地，文獻散佚，資料蒐羅仍有其侷限。根據相關記載顯示：蔡惠如曾長時間在中國停留的經驗，包括商業活動與政治文化活動，前者經歷有1917年創立高密製糖，擔任專務取締役，1919年為北京五國合辦股份有限公司常務理事，晚年仍在福州從事漁業與開墾。¹² 另外，有資料記載他曾在上海與北京兩地，與台灣留學生多所接觸，相關情形也缺乏明確線索可供追查，因此要瞭解他在中國各地的活動，仍有諸多困難無法突破。

蔡惠如（1881-1929），一般資料都記載「名江柳，字鐵生」，筆者認為「名江柳，字惠如，號鐵生」較為合理。¹³ 他在報紙雜誌發表作品，常見的署名以「鐵生」、「蔡惠如」居多，另外他較不為人知的署名，還有「澈心」¹⁴、「木卯生」¹⁵等。蔡惠如出身台中清水望族，其先祖在乾隆年間渡海來台，其後以「蔡源順號」為名，在中國沿海各省經營貿易，累積龐大產業。蔡惠如之父蔡敏南，與兄長蔡敏川感情融洽，兄弟曾在清水共同建築一棟三層樓洋房，名為「伯仲樓」。1918年10月，蔡惠如曾以主人身分在伯仲樓舉辦樂社

12 以上蔡惠如在中國經商之資料，出自《臺灣民報》262號，昭和4年（1929）5月26日，第3版中「蔡氏略歷」，該版為蔡惠如去世之專題報導。

13 如果是名江柳，字鐵生，則「惠如」當是號，較不合理。筆者推測可能是「名江柳，字惠如，號鐵生」，甘得中〈獻堂先生與同化會〉一文，也說鐵生是蔡惠如之號。一般以「字」取代本名行世相當常見，如林獻堂本名大椿，字獻堂，號灌園；林幼春本名資修，字幼春，號南強。又，承審查人之一提供高見，古人「名」與「字」通常具有的關連性，名「江柳」與字「惠如」的關連，或許與「柳下惠」典故有關，特此致謝。柳下惠原為中國春秋時代魯國大夫，後隱遁不仕，被孟子美稱為「聖之和者」。

與鰲西吟社的共同集會，並在會中倡議發起維護漢文之機關，即是後來的台灣文社。¹⁶

關於蔡惠如生平經歷，一般研究者都是根據《臺灣民報》在蔡惠如去世後的專門報導〈蔡氏略歷〉相關記載而來。但這份資料出自林呈祿的手筆，有很多錯誤，未可盡信，需仔細考察釐清。¹⁷

三、蔡惠如的經商生涯：台灣與中國投資的起落

蔡惠如開始在社會上活躍，約始自16歲，〈蔡氏略歷〉記載「明治29年至43年在台中經營米谷（穀）會社及米谷公司，均被選為社長與公司長」。¹⁸此一記載雖常被沿用，¹⁹但其實並不正確。明治29-43（1896-1910）年，蔡惠如的年齡是16-30歲。根據《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的報導：台中林階堂、蔡

14 《臺灣民報》2卷7號，1924.04.21，15版，有署名「澈心」之詞作「浪淘沙遊日月潭」兩首。筆者判斷「澈心」是蔡惠如的另一字號，根據如下（1）陳逢源，《溪山煙雨樓詩存》（台北：龍文出版社，1992.03），頁13-14。有兩首與澈心的唱和詩：〈東京旅次和蔡澈心見贈原韻〉、〈上元夜同澈心、峰山、天金小酌〉（峰山是蔡培火的字，蔡惠如常往來與日本、台灣、中國之間）。同書頁16，陳逢源「治警事件」相關獄中詩作之後，附帶收錄有連橫的〈聞南強、澈心、芳園出獄，走筆訊之〉，這首詩發表在《台灣詩薈》時，題目作〈聞南強、鐵生、芳園出獄，走筆訊之〉，南強、芳園、鐵生分別是林幼春、蔡惠如、陳逢源的號，可見「鐵生」與「澈心」是同一人，即蔡惠如。（2）蔡惠如寫給傅錫祺的信回贈詞作〈醉落魄〉（傅錫祺家屬提供）作品之後的署名，影印本雖被切掉一半，但可看出其是就是寫「澈心未定稿」五字。筆者考證之後，才發現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台中：晨星出版公司，2000.08），頁130，早已指出：「蔡惠如字鐵生，另號澈心」，一般研究者似乎都未曾注意。

15 筆者蒐集到蔡惠如寫給樸社社長傅錫祺的信件（傅錫祺家屬保存），署名「木卯生」。惠如本名江柳，「木卯」應是拆解「柳」字而成。

16 詳見傅錫祺，《樸社四十年沿革志略》（台北：興南新聞社，1943.06），頁6。案：筆者使用版本，與台灣銀行發行「台灣文獻叢刊本」不同，目前未見流通，為林幼春長孫林中堅先生所提供。

17 蔡培火日記1929年6月3日記載：「呈祿在民報上，因為要稱讚惠哥，順便提起啟發會和新民會的解放和設立，他的口氣真不好，又誤報惠如做過新民會最初的會長，我想如此對獻堂先生真是不當，況前已經有〈犬羊禍〉的文案在！所以今日我去信叫呈祿至少得取消說惠哥做過會長的錯誤。」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二）》1929年6月15日：「培火來書，謂東京新民會是先生為會長，惠如為副會長，《臺灣民報》五月廿六日載惠如略歷，說他是新民會長，經已修書，囑呈祿訂正，呈祿不肯，今欲寫一篇訂正文字，登載於《民報》云云。余乃作復函勸其不可，庶免使人誤解與死者爭名，若欲黑白分明，一任會員之記憶可也。」

18 見《臺灣民報》262號，昭和4年（1929）5月26日，3版。

19 如郭嗣汾，〈愛國詩人蔡惠如〉，《台灣先賢先烈專輯·第三輯》（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78.06），頁129：「西元一八九六年，他纔十六歲，就到台中經營米穀會社和米穀公司，……前後十四年間，他一直主持這一事業，先後都被選任社長和公司長。」謝金蓉，《蔡惠如和他的時代》，頁91：「蔡惠如，從16歲開始就在台中經營米穀會社與米穀公司，當了14年的社長和公司長。」許俊雅，《黑暗中的追尋——樸社研究》（中國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06），頁137：「乙未割台，惠如年方15，翌年即至台中經營米谷會社與米谷公司，先後14年間，蔡氏都被選任社長和公司長。」

惠如、吳鸞旂、蔡蓮舫、林季商等人是在1908年（明治41年）初設立台灣米穀會社，最先以林階堂為社長，蔡惠如擔任支配人。²⁰ 這些股東分別來自霧峰林家、台中吳家、清水蔡家，都是台中地區的大財主。1909年3月，蔡惠如被新選任為公司長。²¹ 但隔年（1910）9月，由於米價跌落導致公司虧本，股東有意將公司解散，吳鸞旂、蔡蓮舫、林季商等人並將股份抽出，另組糖米會社。²² 不過根據後續報導（參見下文），蔡惠如仍持續經營該公司，並未將公司解散。

1911年5月15日，台灣米穀會社開定期總會，由蔡惠如報告去年營業狀況。會中並變更定款並改選重役，選任蔡惠如、林瑞騰、王學潛為取締役，鄭肇基、林季商、林慶生為監查役。又經取締役互選，由蔡惠如續任公司長。²³ 1911年12月11日的報導顯示，由於米價上漲，該公司獲利狀況頗豐。²⁴ 此後由於缺乏資料，後續的營業情形如何，不得而知，不過由此可確定〈蔡氏略歷〉所說：「明治29年至43年（1896-1910）在台中經營米谷（穀）會社及米谷公司，均被選為社長與公司長」之記載，不但時間有誤差，任「社長、公司長」長達15年，更是誤記。

蔡家的另一投資是設立輕便鐵路，包括牛罵頭輕鐵、員林輕鐵。牛罵頭輕鐵的路線是由清水經沙鹿至大肚，工事於1908年12月完成，1909年1月開始營運。²⁵ 該會社由蔡敏南（蔡惠如之父）、蔡蓮舫擔任取締役；小元鹽太郎就任監查役，並由蔡惠如擔任支配人。²⁶ 1911年8月1日曾召開股東會議，小有獲利。²⁷ 員林輕便鐵路的投資案則始於1911年7月，當時有台、日籍紳商多人

20 《臺灣日日新報》1910.09.10，3版，標題「實業彙載／米社解散」。

21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9.03.24，5版，標題「雜報／大開宴會」：「今番臺灣米穀公司重役重選一事，前報經載其大略。茲聞新任公司長蔡惠如、神戶支店長張清淡擬來廿六日乘櫻丸赴任，整理一切。中部紳界商界為大開餞筵於新成閣，與會數十名，亦云盛矣。」。

22 《臺灣日日新報》1910.09.10，3版，標題「實業彙載／米社解散」。

23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05.21，標題：「台中通信／米穀公司總會」。

24 《臺灣日日新報》，1911.12.21，4版，標題：「米商得利」：「本年晚稻登場，各農家因鑑於數年來米價高昂，不輕售賣。因之台中米穀公司蔡惠如氏，僅採買二期米七千餘包，得利六千餘金。」。

25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9.01.09，4版，標題「鰲山春信（五日發）／輕鐵告成」。

26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9.02.04，5版，標題「雜報／大肚輕鐵」。

27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08.01，2版，標題「台中最近事業／輕鐵總會」。

爭取籌設，後經台中廳斡旋，總督府准許由日人柵瀨軍之佐、小鹽元次郎，及台人林季商、蔡惠如、陳汝甘等共同投資。²⁸ 7月24日，由台中州廳決定股數：「總股數四千股，每股五十圓，眾皆力爭權利，其後由廳分配，則柵瀨軍之佐、小鹽元次郎各八百，林季商、蔡惠如各四百，陳天送亦四百，餘為員林支廳人民所有，又指定柵瀨軍之佐、蔡惠如、陳天送、葉某四氏為創立委員。」²⁹ 員林輕鐵以兩位日本人的股份最多各佔800股，蔡惠如等三位台籍股東各佔400股，可能是官廳偏袒日籍資本家所致。該會社於9月19日在台中廳總務課開創立會，蔡惠如、林季商、陳天送出席參加，會中決定徵收第一回股金，並討論收買台中製糖會社之鐵軌，以供布設之用。³⁰

此外，蔡惠如投資經營的事業，還包括協和製糖、牛罵頭製帽會社，前者見於《臺灣民報》〈蔡氏略歷〉的記載，後者則可從《臺灣日日新報》看到相關資料，報導中提及他準備籌資二十萬元，成立更大的製帽株式會社。³¹ 綜合上述，可發現至少在1912年以前，蔡惠如的心力主要是投注在商業經營上，經營或參與投資的事業包括米穀公司、輕便鐵路會社、製帽會社、製糖會社等。

1915年以後，蔡惠如開始轉赴中國投資，根據〈蔡氏略歷〉記載，他在中國經營投資的事業包括「大正6年（1917）創立高密製糖，為專務取締役」、「大正8年（1919）為北京五國合辦股份有限公司常務理事」、「大正8、9年（1919-1920）在福州辦開墾事業」，但相關資料難以尋覓，無法追查詳情。不過《臺灣日日新報》1916-1918年的幾則報導，提供蔡惠如回台灣的一些線索，包括1916年12月22日，報導他事業失敗，行蹤不明，後乃知久在上海活

28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07.24，3版，標題「輕鐵准設」。

29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07.29，3版，標題「台中通信（二十五日發）／輕鐵創立」。

30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09.24，3版，標題「台中通信（二十日發）／輕便創立」。

31 見《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3月24，5版，標題「製帽前途」：「牛罵頭製帽公司。開設以來。成效卓著。其公司長蔡惠如氏前赴大阪，調查原料漂白之法。台中廳亦派木村庶務課長久保技師同行。蓋以台中各地所製林投帽。馳名內外。若漂白之法更善。則足為本島工業放一異彩也。又聞蔡氏前籌募資二十萬圓。組織一大製帽株式會社。經已稟請殖產局。此際歸來。當見成立也。」又見《臺灣日日新報》，1912.03.30，5版，標題「台中通信／製帽又起」：「林投帽之消途。早已馳名內外。而台中廳下出產尤多。近者蔡惠如氏籌設一大製帽會社。其事已見本報。茲聞彰化人士亦議設立製帽公司。按集資本二十萬圓。不日當有成議。又聞梧棲港楊子珪氏與其知友數人。合集二萬圓。欲在牛罵頭街設一製帽工場。利之所在。人所必趨。臺灣製帽事業之振興誠可喜也。」。

動，當時因父親蔡敏南去世而於數日前返台，報導如下：

原台中區長蔡惠如氏，曾一時行衛不明³²，後乃知久在上海活動。今回聞其父蔡敏南氏噩耗。因急歸臺。數日前已抵牛罵頭。聞當惠如失敗時。其妹婿鄭伯端氏受累甚鉅。而今無一怨言。則惠如之為人可知矣。³³

鄭伯端是指新竹人鄭肇基，此處記載他是蔡惠如的妹婿，雖然謝金蓉根據田調訪查，認為是蔡惠如的姊夫，但筆者判斷應該是蔡惠如的妹婿無誤。³⁴ 對照蔡惠如1925年寫於牢獄中的詞作「祝伯端老弟四十壽」，曾有「祇憐取管鮑風義，莫笑分金甘下拜，困風塵，難得逢知己」之句，可推測蔡惠如曾因事業失敗欠下鉅款，而連累鄭肇基，由鄭肇基一肩扛起債務，應屬可信。³⁵

1918年3月19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他與林獻堂、陳質芬等人分別往廈門參觀「衛生展覽會」。³⁶ 1918年7月16日，又報導他參與投資苗栗鑛業公司，由新竹人鄭拱辰擔任公司長，蔡惠如擔任常務，因經營得宜，採掘炭質居本島一二等，股價上漲三倍。³⁷ 至於蔡惠如再度返台後，經營商業之情形如何，已無資料可考。1918年9月20日，他在清水家中招待櫟社、竹社、鰲西吟社詩友30餘人舉行盛大詩會，則是屬於文學領域的活動（詳後）。他的商業經營重心，可能都已移轉到中國，加上1920年代以後他長期為台灣民族運動奔走，並未投注心力在事業上，事業會逐漸走下坡，似乎是必然的結局。

32 「行衛不明」是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的用語之一，意指行蹤不行。「行衛」是日文漢語，意同「行蹤」。

33 《臺灣日日新報》，1916.12.22，6版。

34 謝金蓉向蔡惠如之孫蔡意誠查證，認為鄭肇基的元配是蔡惠如的姊姊蔡秋霞（見《蔡惠如和他的時代》，書前〈緣起——第一個走向東亞的台灣人〉一文，編頁號VII）。不過，以蔡惠如詞作「祝伯端老弟四十壽」稱鄭肇基為「老弟」來看，鄭肇基似乎不可能是蔡惠如的姊夫，而是妹婿（稱姊夫為「老弟」，有違常理，稱妹婿為老弟則屬合理），姑存疑以待考。

35 1927年3月1日，蔡惠如聽說鄭肇基因涉嫌賄賂內田內務部長，遭到檢察拘留，連忙乘夜車前往新竹處理，見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一）1927年》，頁100。可看出兩人在患難中的真情。

36 《臺灣日日新報》，1918.03.19，6版，標題「台中之廈門觀光團」。

37 《臺灣日日新報》，1918.07.16，5版，標題「苗鑛公司發展」。

四、蔡惠如的政治活動：從同化會到台灣民族運動

由王詩琅翻譯《台灣社會運動史》一書，在評述台灣同化會之前，有以下一段開頭：

中部台灣人上流社會，在傳統上，其思想素甚進步，比較南北兩地時甚前進，此乃眾所公認之處。而他們之中，其見識抱負實不能輕視者亦復不少，其思想可以視為代表台灣一般知識分子的傾向。因此，其一言一語對台灣三百萬民心可以予以多大的暗示，引起共鳴實無可置疑。³⁸

可見當時中部的社會領導階層，在台灣知識界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中霧峰林家的林獻堂、林幼春，以及出身清水的蔡惠如，更是指標性的人物。林獻堂、林幼春兩人是叔姪關係，感情極深，³⁹而蔡惠如在台中市區經營商業由來已久，與霧峰林家也有共同投資，因此他與霧峰林家的林獻堂、林幼春、林癡仙等人很早就有往來。此外，包括1906年加入櫟社、1915年參與同化會、1920年代參與民族運動，可見他與霧峰林家在商業經營、文學結社、政治運動等領域，都有緊密的互動。

（一）從與日人合作到「同化會」的幻滅

蔡惠如參與政治活動，應該是始於受日本當局委派擔任台中市區長一職，⁴⁰但關於其任職時間，史料記載頗為分歧，《臺灣民報》〈蔡氏略歷〉記載為明治45年至大正3年（1912-1914），筆者則根據「林癡仙日記」推論，就

38 王詩琅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新北：稻鄉出版社，1988.05），頁21。此書即《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臺以後之治安狀況」中卷之翻譯，副題為「台灣社會運動史」。

39 林獻堂（1881-1956）出身霧峰林家頂厝，為林文欽長子，林幼春（1880-1939）出身林家下厝為林文明之孫。林獻堂年齡比林幼春小一歲，但論輩分是林幼春的族叔，林幼春常以「灌叔」稱之，而林獻堂對林幼春的政治謀略與文學造詣都相當倚重。

40 根據《台中廳治一斑》（頁5）記載，「台中區」屬於台中廳直轄，區長役場位置在台中街（今台中市舊市區，即中區及西區一小部分範圍），管轄區域包括藍興堡內所屬的頂橋頭庄、公館庄、台中街、東勢仔庄、旱溪庄、下橋頭庄、樹仔腳庄、番婆庄、半平厝庄、後壠仔庄。該書於大正3年（1914）印行，統計年代：大正元年（1912）。出處：「臺灣日治時期統計資料庫」（來源：http://tcsd.lib.ntu.edu.tw/main_search.php，2013.09.09）。

任時間可能是1913年5月，⁴¹至於去職時間，大約是1915年為「同化會」奔走失敗，憤而遠走中國之後。

政商關係的維護經營，向來是商人發展事業不可或缺的一環，以蔡惠如的家庭出身，乃至參與各種事業投資所需，當然必須跟日本官方保持密切而友好的互動，他早期並無明顯的抗日意識，⁴²而是如一般士紳階層選擇與日本官方合作，他接受台中市區長的任命，應該也有此考量。如果蔡惠如一直選擇與官方合作以利家族事業經營的路線，他不過就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努力營商以獲取利潤為目標的一般商人罷了。但是後來的發展，促使他選擇另一條艱困的道路。其中的關鍵，可能是參與日本伯爵板垣退助⁴³來台灣倡導的「同化會」。

根據王詩琅翻譯的《台灣社會運動史》記載，台灣同化會是由林獻堂主動促成，1913年林獻堂透過友人王學潛居間聯繫，面見板垣退助談論台灣現況。板垣期許台灣人能扮演日華同盟親善的橋樑，林獻堂則希望能藉助板垣的聲望改善台灣所受的不平等待遇。於是板垣由林獻堂出面邀請，在1914年3月、11月兩度來台訪問，並出面擔任「台灣同化會」的發起人，一時聲勢浩大，全台加入者多達三千餘人。不過由於在台日人與總督府的猜忌反對，在板垣退助離台返日之後，情勢生變，1915年1月26日總督府正式以有害公安為由，下令解散。⁴⁴

當時蔡惠如擔任台中市區長，1915年1月他與櫟社創辦人林朝崧（癡仙），以及林獻堂秘書甘得中約定，三人分別到日本會合，準備訪晤板垣伯爵以一探究竟。不料抵達日本之後，發現情勢確實已無法挽回，且臺灣總督府已全面打壓同化會，林癡仙極度失望而返回台灣，⁴⁵蔡惠如則憤而遠走中國。根

41 「林癡仙日記」，1913年5月6日：「賀惠如任台中區【長】，去宴會費三元。」5月14日：「應惠如披露宴。」

42 蔡惠如早期並無強烈的抗日意識，從詩作顯示，有一明顯事例：1909年，伊藤博文在瀋陽被朝鮮志士安重根刺殺，《臺灣日日新報》有大量追弔伊藤博文的詩作，其中也包括蔡惠如的作品。如果蔡惠如此時已有強烈的抗日意識，理當對安重根的舉動抱著同情的態度，否則，至少也不必表態追悼伊藤博文。

43 板垣退助（1837-1919），日本明治維新的功臣之一，出身武士家族，也是自由民權運動家。1887年受封為伯爵，1900年退休。1914年3月、11月兩度受林獻堂之邀來台，倡組「台灣同化會」。

44 王詩琅譯，〈第一章第二節·台灣同化會的成立〉，《台灣社會運動史》，頁21-39。

45 關於林癡仙與同化會事件之關係，可參見廖振富，〈櫟社三家詩研究——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1996），頁48-55、頁149-155。

據甘得中的回憶，蔡惠如當時在日本留一封信給林朝崧與甘得中，大意为：

在臺日官僚，不顧國家元勳，竟敢構陷藉以解散同化會，其毒辣如此，況我們耶？想起曾被台中廳警務課長荒卷鐵之助讓⁴⁶弟曰：「你身為區長，擅離職守，此後宜謹慎，否決不你宥！」偶念及此，與其置身樊籠，不如高飛，今請與二君子暫別，他日問候，當不在日本時也。⁴⁷

蔡惠如語氣之悲憤如見其聲色，他形容生活在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是「置身樊籠」，這可說是其民族意識覺醒的明顯徵兆，也從此放棄所謂「同化」的夢想，對日本治台政策不抱持正面的期待，並轉而在1920年代出面組織台灣知識青年展開文化抗日運動。

（二）政治立場轉向，積極投入台灣民族運動

蔡惠如真正崛起於台灣民族運動之陣營，並扮演舉足輕重之領導者角色，應該是以1920年在東京先後倡組「新民會」為發端。根據當時共同奮鬥的同志知識青年的回憶，蔡惠如有感於留日台灣知識青年空有理想而缺乏有力組織，1920年1月於是在他東京澀谷的寓所，籌組「新民會」，並決議創辦雜誌以作為宣傳刊物。後來更慨然贊助1500圓，使雜誌能順利出刊發行，這就是在台灣民族運動史上扮演舉足輕重角色的《台灣青年》的由來。⁴⁸至於該組織的活動路線，經過多次討論，決定從原先的「六三法撤廢運動」轉變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⁴⁹另一方面，由蔣渭水發起的「臺灣文化協會」，1921年10月21日正式在台北成立，並推舉林獻堂擔任總理。台灣本土知識菁英與留日青年，從此結合為聲勢浩大的非武力抗日運動陣營，透過辦雜誌、巡迴演講等方式展開一連串的宣傳活動，並連續進行十多年的請願活動。

46 「讓」，責怪之意。

47 甘得中，〈獻堂先生與同化會〉，《林獻堂先生紀念集（三）·追思錄》（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複印本，2005.12），頁78。本段引文，筆者為求便於理解，曾改動部分標點符號。

48 林呈祿，〈對蔡惠如氏平生的感言〉，《臺灣民報》262號，1929.05.26，頁3。

49 葉榮鐘，〈第四章·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台中：晨星出版公司，2000.08），頁133-134。

由於蔡惠如對留日台灣青年影響甚大，日本官方史料稱他是留日青年的指導、統帥，並認為「蔡惠如等人的思想深刻地支配著（台灣留日）青年學生的意識」。⁵⁰當時即使台灣本地的知識青年也對他非常崇拜，如黃旺成在日記中記載1923年10月，第一次在清水蔡蓮舫家中見到蔡惠如的印象，有如下的描述：

夜大名鼎鼎之蔡惠如君，同窗友陳其泮君來，見其風采堂堂、談論風生，令人起敬。⁵¹

黃旺成筆下對蔡惠如充滿高度敬意，可見他熱情豪邁的特質對年輕人很有吸引力。葉榮鐘撰寫專文介紹蔡惠如時，形容他「講義氣、重然諾、富有熱情」，更特別推舉蔡惠如的胸襟氣度，雖然他當時深受台灣留日青年的愛戴擁護，但居於各種實際考量，他堅辭「新民會」會長職位，強調唯有林獻堂方能勝任該職位，自願擔任副會長。⁵²

1921年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正式展開，首次請願之連署者共178人，多為留學日本的台灣學生，台灣連署者僅有10多人。第二次由林獻堂領銜，在台灣各地宣傳，獲得廣大迴響，全台連署者有351人，留日留學生有160餘人。林獻堂等人在1922年1月赴日本，蔡惠如由上海來東京與林獻堂商議，並分頭遊說日本國會議員。⁵³不料，1922年9月台灣總督為打壓分化請願運動，由總督召見林獻堂等八人，施以強大壓力，林獻堂因此暫時退出請願運動，此即所謂「八駿事件」，這段風波導致請願運動陣營極大的爭議，林獻堂飽受同志攻擊，其中最被熟知的事證是《台灣青年》雜誌刊登柳裳君的小說〈犬羊禍〉加以諷刺。而筆者推測：蔡惠如可能也對林獻堂相當不滿，理由是1929年5月蔡

50 王詩琅譯，《台灣社會運動史》，頁43。

51 《黃旺成先生日記（十）1923年》，1923年10月24日，頁370。當時黃旺成在蔡蓮舫家任職，蔡蓮舫是蔡惠如的族叔。筆者2011年2月起參與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黃旺成日記解讀班」，曾親見該冊日記影印本，感謝解讀班主持人許雪姬教授同意參閱。

52 葉榮鐘，〈台灣民族運動的鋪路人——蔡惠如〉，《台灣人物群像》（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95.04），頁210-217。

53 葉榮鐘，〈第四章·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頁147-153。

惠如去世後，蔣渭水發表的悼念文章〈對蔡惠如氏平生的感言〉有以下片段：

我又記得大正十二年同他上京請願臺灣議會的時候，同宿在若松町臺灣民報社樓上，同培火、逢源兩同志，四人連枕而臥，更深夜闌的時候，互相談起臺灣的問題來，他就慷慨悲歌攻擊臺灣同志的做事不澈底，容易被人妥協，罵得極其痛快，至於至情則聲淚俱下，其形容至今猶存在我的腦底。⁵⁴

從時間點與描述內容判斷，當時蔡惠如「慷慨悲歌攻擊臺灣同志的做事不澈底，容易被人妥協」所攻擊的對象，極可能就是針對林獻堂而發，此一事例清楚呈現兩人個性的差異。

1923年2月6日，蔣渭水、蔡培火、陳逢源三人被推選為第三次請願代表赴日本請願。由於總督府的壓制，本次連署人數降為278人。1月28日，蔡惠如由上海抵東京，與同志集會研商，2月13日舉行台灣請願代表歡迎會。2月16日請願代表再度恢復在台灣被取締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蔡惠如新加入為會員，並與蔡培火、蔣渭水、林幼春、林呈祿等人同時被選為專務理事。2月23日，由蔡惠如領銜向帝國議會提出請願書。

1923年12月16日，台灣總督府為打壓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發動全島大搜捕，即是著名的「治警事件」。當時蔡惠如人在台灣，以他在請願運動中擔任重要的領導角色，當然也在被羈押之列，數日後他與同志29人都陸續被移送拘留於台北監獄，⁵⁵在1924年1至2月間分別獲釋。其後從1924到1925年，歷經三次審判，1925年2月20日共有7人判刑確定。蔡惠如與林幼春、蔡培火、蔣渭水、陳逢源等人，分別被判刑3、4個月，並陸續入間服刑。後來入獄諸人同時在1925年5月10日，被日本官方提早釋放出獄。蔡惠如被羈押期間，以及審判確定後入獄服刑期間創作詩詞甚多。與蔣渭水相同的是，他們兩位原本都活

54 蔣渭水，〈對蔡惠如氏平生的感言〉，《臺灣民報》262號，1929.05.26，頁3。

55 根據黃旺成日記記載（參見1923年12月16、17、21、22、24、26、27日），林幼春被移送台北的日期是12月22日，蔡惠如則是12月24日由特務中村押送，當時林獻堂特別在台北火車站迎接。

躍於政治運動領域，極少提筆寫作，卻都因緣際會在服刑前後寫下不少動人的作品，刊登在《臺灣民報》、《臺灣詩薈》等刊物，造成極大的宣傳效果。⁵⁶

蔡惠如除了積極在日本與留日青年並肩奮鬥，同一時間，他與留學中國的台灣學生也有密切聯繫，曾先後參與北京、上海等地的台灣學生組織，被日本警務單位視為頭號問題人物，認定他是台灣留華學生的從事抗日運動的主要領導人。⁵⁷可惜蔡惠如在中國的行蹤與事蹟，目前缺乏直接資料可供查考。

除了入獄，在治警事件審判期間，蔡惠如發生意外受傷。詳細情形是：1924年，以林獻堂等人為首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代表，為反制辜顯榮等人組織「有力者大會」，企圖阻撓請願運動，1924年7月3日決定同時在台北、台中、台南發起「無力者大會」，其中以台中一地之規模最盛大。而蔡惠如在參與籌辦「無力者大會」的前兩天，在台中市區因坐人力拉車被狗意外衝撞而跌斷腿骨，這件事在無力者大會召開時引起眾人的關切，林獻堂更藉此暗諷當局，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對此事有相當生動的記載：

獻堂君出首演說，閤閤而語，侃侃而言，到隱微要點處，會員擊掌之聲如放連炮一般。後言作事須要仔細，如前夜蔡惠如君為此事在大正館坐人力車，到電光微暗處，不防被一犬沖〔衝〕撞，致車覆人傷，現尚入院治療。蓋犬者即暗指辜氏也，隱他請議會被辜氏阻礙故也，……終則林載昭〔釗〕君出席，言蔡惠如君為上京請議會事件，竭力不辭勞瘁，今為無力者大會致足傷入醫，然亦塞翁失馬未知禍福，諸君定同感激，應選二名作代表入院慰問如何，眾會員僉舉林幼春、黃周二作代表云。⁵⁸

內容雖然是記錄「無力者大會」舉辦時的盛況與民心趨向，但可以明顯看出蔡

56 詳細分析討論，請參見筆者，〈日治時期臺灣「監獄文學」探析——以林幼春、蔡惠如、蔣渭水「治警事件」相關作品為例〉，《台灣古典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晚清到二二八》（台北：國立編譯館，2007.07）。

57 王詩琅譯，《台灣社會運動史》，頁121-124、162-164。

58 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六）》，大正13年7月3日，頁221-224。

惠如由於長期付出努力，在抗日陣營中佔有重要地位，因而受到當時台灣民意的推崇與擁護。針對蔡惠如意外受傷，櫟社好友陳槐庭、傅錫祺都曾填詞加以慰問，蔡惠如本人事後也回贈答謝（詳見下文）。

1926年以後，台灣文化協會由於左翼青年之加入，並積極爭取主導權，導致內部矛盾逐漸擴大而尖銳化。1926年10月17日，台灣文化協會在新竹市舉開第六次年會時，蔡惠如曾以理事身分出席，並提議修改章程獲得通過，後來導致文協的分裂破局。⁵⁹ 1927年1月3日，文協在台中公會堂召開臨時總會，由於左翼青年參加者極多，經過選舉，文協正式由連溫卿等左翼青年所掌控。⁶⁰ 林獻堂、林幼春、蔡惠如等人從此退出文協，蔡惠如似乎也逐漸淡出政治運動。

根據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等資料顯示：蔡惠如1927年2-3月間在台灣。⁶¹ 1927年3月11日，他曾力勸林獻堂不要進行環球旅遊，建議將這筆資金投入《台灣新民報》計畫發行日刊的經營，但林獻堂並未接納他的建議。⁶² 1929年1月27日，《台灣新民報》社開取締役會，蔡惠如擔任相談役一職。⁶³ 1929年2月28日，林獻堂在台北江山樓受羅萬俔之晚宴招待，蔡惠如應邀參加餐會。次日，蔡惠如、蔡式穀來台北高義閣旅館拜訪林獻堂，⁶⁴ 這也是蔡惠如與林獻堂最後的晤面。其後他又轉往福州，直到5月12日因患腦溢血症，由福州歸台，入中村醫院治療，⁶⁵ 延至5月20日不治，得年僅49歲。

五、蔡惠如的文學活動與創作：從「維護漢文」到「啟蒙意識」的覺醒

相對於1920年代積極投入政治活動，以及實際的商業經營投資，蔡惠如長年在中國、台灣與日本之間奔走，大致說來，他的文學活動及創作，只能算是從事政商活動之餘的使命感與興趣，或身為社會仕紳階層文學涵養的展現，並

59 王詩琅譯，〈文化協會的方向轉變〉，《台灣社會運動史》，頁334。葉榮鐘，〈第六章第五節·文化協會的分裂〉，《日據下臺灣民族運動史（下）》，頁383。

60 王詩琅譯，《台灣社會運動史》，頁335-338。

61 本文所附「蔡惠如年表初編」，1927年之相關記載，資料出處有清楚說明。

62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一）1927年》，頁104。

63 《臺灣民報》，1929.02.03，標題「新民報社推薦 顧問、相談役」。

64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二）1929年》。

65 〈餘錄〉，《臺灣民報》，1929.05.19，頁9。

未長期投入，遺留的作品數量也不多，但他大約在1919-1925年間，在台灣、日本、兩地積極奔走並慷慨解囊，對台灣文學與文化啟蒙運動的倡導與實踐，實具有重大的意義，其影響力與貢獻，值得重新加以評估。

蔡惠如入獄前後之相關詩詞近年備受學界矚目，筆者及後續研究者論之已詳，本文不擬贅言。⁶⁶ 筆者先前研究早已指出：其入監服刑的古典詩詞具有「用語展現時代新思潮，深具啟蒙意義」的特質。⁶⁷ 與此論點可相呼應的是：他在《臺灣》、《臺灣民報》系列刊物所發表的五篇文言體與白話體文章，雖然數量不多，卻能充分展現其扮演新時代之啟蒙者的企圖與新思維，雖然文體新舊有別，但所展現的思想意識則是一貫的。以下簡述其文學活動及創作之概況，並初步分析其作品之時代意涵。

（一）維護漢文的使命感：從加盟櫟社到發起台灣文社

蔡惠如於1906年12月加入櫟社（參見附錄圖1），不過由於他長期為商務及民族運動往來於日本、中國各地，從入社到1929年去世為止，長達23年間，他參加櫟社正式活動的次數僅有9次，可見他投入文學活動的時間並不多，詳如下表。

附表1 蔡惠如出席櫟社活動表

時間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備註
1907/10/26	彰化大庄賴紹堯住宅	秋季小集	賴紹堯為櫟社最初發起人之一，首任社長。

66 除前文提及廖振富、林佳蕙、許薰文的研究，另外王建國、黃文成兩人的博士論文都同時以台灣監獄文學為研究主題，也都曾對蔡惠如的相關作品有所討論。參見王建國，〈百年牢騷：臺灣政治監獄文學研究〉（台南：成功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黃文成，〈受刑與書寫——臺灣監獄文學考察（1895-2005）〉（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5）。又，黃文成曾將其博士論文改寫為專書出版：《關不住的繆思——臺灣監獄文學縱橫論》（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08.04）。

67 廖振富，〈反抗詩學：日治時期臺灣「監獄文學」探析——以林幼春、蔡惠如、蔣渭水「治警事件」相關作品為例〉，《台灣古典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晚清到二二八》，頁148。

1912/06/15	霧峰萊園	櫟社十週年大會	因鐵路交通中斷，後續詩會由蔡惠如招待，在台中米穀公司舉行。
1914/04/27	台中蔡蓮舫別邸	日本漢詩人杻山衣洲來台歡迎會	杻山衣洲在1899-1903年間，擔任《臺灣日日新報》漢文主編，影響力大。
1918/09/20	清水蔡惠如宅「伯仲樓」	櫟社、鰲西詩社開兩社聯合詩會	台灣文社之創立，源自蔡惠如在會中之呼籲。
1924/03/22	霧峰萊園	櫟社社長傅錫祺銀瓶紀念進呈式活動	配合該社成立二十週年，感謝社長之付出。
1925/06/06	霧峰林獻堂宅	林幼春、蔡惠如出獄慰安會	林、蔡因「治警事件」被判刑三個月，但在5月10日提前出獄。
1925/11/14	霧峰林獻堂宅	櫟社秋季小集 ⁶⁸	
1926/06/15	霧峰林獻堂宅	櫟社為社長傅錫祺由中國返台洗塵	
1926/09/01	台中吳子瑜怡園	櫟社壽椿會	

比起林癡仙、林幼春、賴紹堯、傅錫祺、林獻堂、陳槐庭等人對櫟社的投入，詩社活動顯然不是蔡惠如的生活重心。不過筆者根據「傅錫祺日記」、「林癡仙日記」的記載發現：早年在台中經營事業時期，1906-1912年間，是他與櫟社友人互動相當頻繁的階段，他或作東邀宴櫟社詩友，⁶⁹或參加

68 筆者根據《櫟社沿革志略》記載仔細核算，該書記載蔡惠如出席之櫟社正式集會只有8次，不過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六）》1925年11月14日，頁418-419。記錄他出席在霧峰林獻堂住宅舉行的櫟社秋季小集，蔡惠如也曾出席。而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頁13，記載此會出席社員僅7人，無蔡惠如。由於傅錫祺當時人在中國，未出席此會，而張麗俊不但出席，還描述林獻堂要求蔡惠如、張麗俊等人需飲酒十餘杯之細節，可信度高，故筆者推測應是傅氏記載有誤。

69 「傅錫祺日記」記載蔡惠如設宴作東者，有（1）1908年6月19日蔡惠如為其父祝壽，設宴招待。（2）1909年3月11日，蔡惠如宴請傅錫祺、陳槐庭、連橫於台中合昌商會。（3）1910年12月10日，蔡惠如招宴櫟社諸友林癡仙、傅錫祺、蔡啟運等人，宴後在中央醫院開擊鉢吟會。（4）1911年2月21日，蔡惠如宴請福建工業學堂監督施景琛、福建商業學堂監督陳訓旭、福建農業學堂教習洪禮修等人於合昌樓，並招櫟社諸友陪宴。而「林癡仙日記」記載的有（1）1909年4月24日，蔡惠如舉辦春餅宴，林癡仙等人受邀參加，會後受蔡惠如贈東京土產數種。（2）1909年4月30日，林癡仙夜邀蔡惠如、林仲衡、陳槐庭、鄭汝南、張棟梁到常盤樓飲酒。

櫟社「金曜會」、或主動邀友人擊鉢作詩，⁷⁰或聯袂出席林獻堂的「萊園詩會」，⁷¹與櫟社詩友互動相當頻繁，下文引述1929年6月蔡惠如去世後，從陳貫寫給傅錫祺的明信片，也可印證這一點。

以1912年為例，他在1月23日、2月12日、2月21日、2月23日、2月24日，連續多次邀集櫟社友人作詩。3、4月他因商務赴日本考察，一回台灣，又立即在4月18日邀詩友擊鉢作詩。同年6月15日起一連四天，櫟社在霧峰舉辦十週年大會，由於適逢大雨成災，大甲溪鐵橋被沖斷，鐵路不通使北部詩友無法北歸，蔡惠如更熱情招待各地詩友在其台中米穀會社停留，舉辦「大墩小集擊鉢吟」，留下不少詩作。⁷²上述資料，充分反映蔡惠如個性熱情好客、慷慨豪爽的特質。從筆者新發現這封寫於往日本船上的信，可見證他與櫟社詩友的友誼：⁷³

鶴亭社兄史席：日前在北，奉讀諸君和章，豪情麗句，大壯行色。私衷感戢，楮墨難宣。弟於一昨日，由基啟輪，幸賴福星照蔭，海天一色，浪靜風平，真覺爽快異常。船中又有木村課長、久保技師，及廣東友人曾少南、嘉義王○山、敝鰲峰蔡詒祥諸君，日夜談心，頓忘其寥落。知關注存，謹泐數行奉告，以慰錦懷。此番弟到台北，再作舊遊，時有所感，作成七絕四首，鄙俚可笑，聊記情懷已耳。錄呈於後，伏乞郢正，幸勿譏其放浪為禱。此請

吟安

弟 惠如書

70 1911年10月4日，蔡惠如列席櫟社次級團體「金曜會」成立一周年紀念會於米穀公司，與會者有傅錫祺、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張升三、連雅堂等十數人，作擊鉢吟二題。見「傅錫祺日記」，1911年10月4日。又見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三）》，1911年10月4日，頁119。

71 「傅錫祺日記」關於蔡惠如參加金曜會的記載有：（1）1911年12月5日蔡惠如與傅錫祺、林載昭同赴阿罩霧，參加萊園詩會四周年紀念會活動。（2）1912年2月23日，該夜逢金曜會會期，傅錫祺、蔡惠如、鄭邦吉、陳貴、林載昭諸友開擊鉢會於報社編輯局。（3）1912年2月24日，夜受蔡惠如邀請參加擊鉢吟會，與會者有王學潛、鄭邦吉、陳聯玉、林載昭等人。（4）4月18日，傅錫祺夜至蔡惠如之米穀公司參加擊鉢吟會。

72 上述各項活動的櫟社集體詩作，有一大部分目前都被收藏在台大圖書館特藏室，筆者專書《櫟社研究新論》第二、三、四章有深入分析。

73 蔡惠如致傅錫祺信函，原件無記年，參見附錄圖2。

豁軒、望洋二兄均此不另

台北旅次書贈彩雲校書

一見真如月下仙，酸言嗔態總堪憐。問郎到此何多日，想為新歡忘舊緣。
酒闌燈灺五更寒，又話離愁淚暗彈。最是不堪明月夜，消金帳裏綉衾單。
謝娘欸欸餞瓊筵⁷⁴，忍淚尊前別恨牽。惆悵元宵何處望，汪洋萬里月明天。

為感臨歧贈淚巾，教儂親看淚痕新。叮嚀記踐花朝約，莫負鴛鴦夢裡看。

木卯生未是稿

雖然原信未見紀年，但筆者考證應該是1912年元月所寫。理由是1912年1月，傅錫祺曾寫〈依韻送惠如東遊〉一詩為他送行，而本年正是他與櫟社有人互動最多的階段。信函之後所附的〈台北旅次書贈彩雲校書〉四首七言絕句，濃情豔語，纏綿旖旎，反映的是蔡惠如風流浪漫的一個側面。

值得關注的面向是，蔡惠如參加櫟社的正式活動雖然不多，他在社中卻有相當大的號召力，以及鮮明的個性展現。這固然與其一貫的豪氣與社會地位顯赫有關；另一方面，也是他個人行動力強、深具領袖魅力有以致之。如1911年1月30日，他與連橫兩人開風氣之先在台中斷髮，⁷⁵是櫟社詩人中最早斷髮的，隨後櫟社詩友也陸續在1912年間剪去象徵清朝法統的辮子。⁷⁶櫟社詩友莊雲從在一組送給櫟社友人的系列作品中，如此形容他：

羈愁春睡兩模糊，佳客來時有鳥呼。愛汝文明除舊弊，鏡中新鑄好頭

74 作者原註如下：「彩雲姓謝，設筵為予餞別」。

75 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02.01，2版，標題「斷髮勵行」：「本社記者謝汝銓氏。提倡斷髮不改裝會以來。各地響應。而台中合昌商會理事連雅棠，與臺灣米穀公司長蔡惠如二氏。經於本日正午。各將辮髮斷去。合拍一照為紀念。二氏原擬紀元節日。與台北同志者寔行。因是日欲偕赴南社總會。恐有不便故先斷去。以為台中人士之先導。又聞連氏斷法之後。霧峰富豪林獻堂氏贈以禮服一襲為祝其革新之意。」

76 參見筆者專書《櫟社研究新論》，頁138-140，對櫟社的斷髮時間與相關詩作均有討論。關於斷髮運動之研究，可參考廖怡超，〈日治初期臺灣「斷髮」現象研究——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主要範圍〉（台中：中興大學台灣文學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9）。

顱。⁷⁷

所謂「愛汝文明除舊弊，鏡中新鑄好頭顱」便是指蔡惠如斷髮，是走在時代尖端的具體展現。又如，1918年9月20日起連續兩天，蔡惠如在清水住宅「伯仲樓」舉辦大規模詩會活動，以其個人之力招待櫟社、鰲西吟社及竹社詩友30多人，會中他有感於漢文將絕，倡議設立機關設法維持，才有台灣文社成立。筆者新發現的1918年12月8日蔡惠如致傅錫祺的信，可看出他在會後努力為臺灣文社之創立勸募資金的情形（參見附錄圖3、4）：

鶴亭先生鈞鑒：昨讀 手示，敬悉一切。鄙意暫以現則實行較為妥穩。先生竟有同情，深為慰。評議員擬欲加選基成翁、邦吉君二人，弟大贊成，第不知獻、春、瑾諸公意見何如？乞一詢之為是。家叔敏庚及家詒祥，均得承諾為特別社員，各許捐五拾金，又楊肇嘉亦許納貳拾金，加入特別社員之列，祈即為之註冊荷之。此佈。即請

文安

弟

期○○頓

十二月七日

這封信寄信者之署名已經模糊難以辨識，但從信中提到「家叔敏庚及家詒祥」（蔡惠如之父親為蔡敏南，蔡敏庚為其族叔）願意擔任「特別社員」，以及鄭邦吉、楊肇嘉等願意擔任評議員，這些人都是清水地區名人，可確定寫信者必是蔡惠如無誤。信中所說「第⁷⁸不知獻、春、瑾諸公意見何如？」則是提醒傅錫祺「評議員」之新增人選，必須徵求林獻堂、林幼春、林子瑾等人之同意，因為他們都是台灣文社發起時的核心主力。配合文社成立時間之考察，可確定是這封信是1918年12月7日所寫。

77 本詩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05.08，1版。作者原註如下：「惠如近日過訪於五汴仔庄，故前聯言及之」，此詩又收入《櫟社第一集》，但無此註解。

78 「第」，是「只、但」的意思。

（二）啟蒙意識覺醒，文體新舊並陳：參與民族運動後的文學創作

1920年起，他的社會活動場域轉向日本東京，與留日學生密切接觸，進而被留日青年奉為精神領袖，開展波瀾壯闊的政治運動。1922年在東京期間，他曾與林獻堂、莊太岳、李漢如等人在林獻堂的東京寓所「雨聲庵」舉行擊鉢吟詩會，並以「雨聲庵吟草」為題，將詩作刊登在《台灣青年》雜誌。⁷⁹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還包括陳虛谷、王敏川（錫舟）等新世代的知識分子，見證新舊兩代知識分子在日本東京的緊密互動。

另外必須格外關注的是，蔡惠如在1920-1925年間，陸續在《台灣青年》、《臺灣民報》發表五篇文章，包括〈我之所望於青年：平等與自覺心〉⁸⁰、〈臺灣青年之大責任〉⁸¹、〈論中國將來之興亡〉⁸²、〈祝臺灣民報創刊〉⁸³、〈就臺灣雜誌社五週年紀念的感想〉⁸⁴，前三篇屬文言文，後兩篇則是白話文，不論是文體演變及作品思想內涵的時代性，都充分反映台灣新文學運動萌芽階段的特殊現象，值得進一步探索。第一、二篇勉勵台灣青年應關心台灣前途，擔起重責大任，具有改革社會的理想。第三篇關心中國局勢，並寄予深切期待，是其祖國情結的表露。第四、五篇則是針對創辦《台灣青年》、《臺灣民報》的理想而發，特別以白話體練習寫作，其目的正是透過具體實踐，響應文化啟蒙運動，以白話文達到普及推廣與啟發民智的效果。

而貫串以上五篇文章的核心理念，是強烈的漢族認同，以及喚醒台灣人奮發向上，追求平等自由的自覺。另一具備高度意義的現象是，他在這些文章中頗能掌握近代西方文化中的啟蒙思想概念，乃至民主政治發展的概況，並引為具體有力的論說依據。以發表於1920年的〈我之所望於青年：平等與自覺心〉一文為例，他以旁敲側擊的文字，呼籲台灣人要從日本殖民統治的不合理待遇

79 《台灣青年》4卷2號（1922.02.15）「漢文之部」，頁35-38。

80 《台灣青年》1卷1號（1920.07.16）「漢文之部」，頁53-54。署名：蔡鐵生。本篇文章之標點符號與段落，皆為編者所加。

81 《台灣青年》1卷5號（1920.12.15）「漢文之部」，頁4-5。署名：蔡鐵生。

82 《台灣青年》2卷1號（1921.01.15）「漢文之部」，頁2-4。署名：蔡鐵生。

83 《臺灣民報》1號，1923.04.15，頁2。署名：蔡鐵生。

84 《臺灣民報》67號，1925.08.26，頁38-39。署名：蔡鐵生。

中覺醒：

人每自慙於社會國家，胥蒙不平等之待遇，夫社會國家，胡為以不平等待遇吾人，非以其必倚賴，或受其保護，始能生存耶。倚賴斯為勢所乘，受保護斯為力所制矣。非以之其智能之不逮耶。⁸⁵

換句話說：不受控制，擺脫對殖民政府者的倚賴，台灣人的「自覺」才是關鍵。因此，他殷殷叮嚀：「人類欲期真正之平等幸福必先有自覺心，自覺心之餘，則勤苦奮勵，日躋競競，以自進於高等人格、高等智能。」文中更引18世紀法國啟蒙時代的哲學家盧梭（Rousseau, 1712-1718）「欲救人類之墮落，由不善而返於善，惟有破棄此可厭之文明而復自然」之言，⁸⁶這是聲東擊西的障眼法，而更鏗鏘有力的控訴，則是以下這段文字：

人惟文明愈備，向嗜欲愈勝；嗜欲勝則權利之想急切。因權利而爭競，爭競之勝負決，而階級判然矣。法律不平等、經濟不平等、衣食住不平等，迄於今日，變本加厲⁸⁷已臻極點。然吾儕苟一反躬自省，溯厥繇來，果操於已，抑⁸⁸操於人，其理詎不灼然可觀哉。

所謂「權利爭競，爭競之勝負決，而階級判然矣」，指涉的當然是日本對台灣殖民統治所造成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階級矛盾，接著，作者筆鋒毫不遮掩對日本殖民當局的強烈控訴：「法律不平等、經濟不平等、衣食住不平等，迄於今日，變本加厲已臻極點」，可謂順理成章，極具說服力。

85 出處同註80。以下凡引本篇，出處皆同此，不另註。

86 蔡惠如〈獄中有感〉詩云：「成敗如今且休問，盧梭民約見全書」，顯見他對盧梭的思想並不陌生。筆者〈反抗詩學：日治時期臺灣「監獄文學」探析——以林幼春、蔡惠如、蔣渭水「治警事件」相關作品為例〉一文，曾有以下分析：「盧梭是法國自由思想家，其著作《民約論》，主張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對西方近代民主政治有鉅大的影響。1920年代，『民族自決』」的世界性思潮瀰漫全球，成為被奴役、被殖民者共同追求的目標。惠如雖出身傳統士紳，但在政治思想上，透過政治啟蒙運動的參與，可說與時代潮流同步接軌，並未落伍，更非抱殘守缺之輩。」見筆者，《台灣古典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晚清到二二八》，頁149。

87 筆者按：原文作「屬」，應是「厲」之誤植，筆者直接改正。

88 筆者按：原文作「柳」，應是「抑」之誤植，筆者直接改正。

在〈臺灣青年之大責任〉一文中，他更引述德國人的「日耳曼魂」、美國費城獨立廳裡的「自由鐘」、英國倫敦泰晤士港中「勝利號」（紀念18世紀納爾遜將軍擊敗法西聯合艦隊的戰船），激發國民強烈的愛國心，顯示他對西方列強的國家歷史與政治有一定的瞭解。需要特別留意的是，作者雖標舉「愛國心」，⁸⁹但行文前後的訴求對象都是集中在「臺灣青年」，「臺灣」的前途與命運，才是他關心的焦點，文中從未出現「日本帝國」一詞，與當時常見媒體常見的「同化」或「國民性」等語彙，形成鮮明的緊張對立，可見他所謂「愛國」的指涉對象，絕非日本帝國，而是以漢族認同為核心，此一民族意識已清楚顯露。

至於〈論中國將來之興亡〉一文，他對近代中國民初政治發展，充滿樂觀的看法，強調中國近來民氣一振，人才輩出、正逐漸轉弱為強，未可輕侮。最後，全文如此收尾：「其民智程度，已覺蒸蒸日上之勢。而國運之興隆，誠可計日而待也。」若以客觀史實加以檢證，1921年前後的中國政情與國勢發展，顯然不是如此樂觀，蔡惠如在文章中流露的顯然是個人主觀的期待，與鮮明的中國認同。

1920年創刊的《台灣青年》，為了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在1922年4月改組為《臺灣》雜誌，1923年4月更進而創辦半月刊形式，以白話文為書寫工具的《臺灣民報》。蔡惠如在《臺灣民報》創刊號所發表的祝詞文章，是目前所見他寫的第一篇白話文，以舊文人出身，能以新知識青年並肩奮鬥，更執筆嘗試以北京話為主體的白話文，其文學史意義不容小覷。試引片段如下：

噫！我們最親愛的臺灣兄弟，快快醒來！漢文的種子既然要斷絕了，我們數千年來的固有文化，自然亦就無從研究了。連我們自己的民族觀念都消滅了，將來世界上的人類若比較起來。我們就可以排在最劣等的裡面了。但是劣等的人類，究竟叫做什麼東西？有人說叫做奴隸。這個奴隸

89 原文為：「此等精神，萬世不滅，無論何人，對之、見之、聞之、莫不肅然起敬，油然而生愛國之心者也。」

的名詞，我們臺灣的兄弟到底承認不承認？若是承認，我就沒有話說，若是不承認呢？趕緊想個法子，去補救漢文的一線生機。使這風燈上頭的種子，永久不滅，就是保存我們的固有文化，振興我們漢民族的觀念。⁹⁰

從引文中可出：蔡惠如的努力，在台灣文學史上實具有重大意義，他為了保存漢文，1918年10月曾在故鄉台中提議發起「台灣文社」，並由櫟社核心主幹在1919年創刊《臺灣文藝叢誌》，該刊以文言體漢文為主要傳播形式。而到1920年，創刊於東京的《台灣青年》，以留日台灣青年為主，該刊「漢文之部」所刊登的文章已蛻變為較為淺白的文言體。

大正9年（1920）7月，陳炯在《台灣青年》創刊號發表〈文學與職務〉，率先呼籲改革舊文學，提倡白話文，該文之末還特別提到：「嘗聞我臺有文社之設，已經年餘有光彩之歷史矣。想對此方面，必有大貢獻」。⁹¹所謂「文社」，正是指由蔡惠如發起的「台灣文社」，其資訊來源可能是由蔡惠如等人告知。而接續改革舊文體的觀點，又有陳端明的〈日用文鼓吹論〉，他批判台灣漢文「文體株守舊套」，不利於大眾文化之普及，強烈主張將漢文改革為「白文」（即「白話文」）。⁹²以上兩篇文章，都是由台灣留日知識青年為了普及文化，要求改革舊文體的先聲。

1923年1月，黃呈聰和黃朝琴在《臺灣》雜誌（《台灣青年》更名）同時發表〈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和〈漢文改革論〉，兩篇文章都是以白話文寫成，都同時主張以白話文取代文言體漢文。⁹³綜合上述，該刊接二連三提出文體改革的主張，其實正是緣自推展民族運動、文化啟蒙之迫切需求。基於此一背景，蔡惠如在這篇文章的最後，也清楚表達他對台灣知識青年提倡白話文的支持：「所以留東青年黃呈聰、黃朝琴兩君有鑑及此，因此暢設這個民報。白

90 《臺灣民報》1號，大正12年（1923）4月15日，頁2。

91 《台灣青年》創刊號，「漢文之部」頁41-43，引文見頁43。

92 《台灣青年》3卷6號，大正10年（1921）12月，「漢文之部」，頁31-34。

93 《臺灣》第4年第1號，大正12年（1923）1月。黃呈聰〈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刊於「漢文之部」頁12-24，黃朝琴〈漢文改革論〉分兩期刊出，上篇見於第4年第1號，頁25-31；下篇題為〈續漢文改革論：唱設臺灣白話文講習會〉，第4年第2號，頁21-28。

話文是言文一致，很容易了解。」他積極響應學習以白話文寫作，也展現初步成果，在上述文章裡，除了感嘆詞「噫！」、「自然亦就無從研究」的「亦」字之外，文言的痕跡大抵已消失了。

時隔兩年四個月，1925年8月蔡惠如又在《臺灣民報》發表〈就臺灣雜誌社五週年紀念的感想〉一文，文章開頭將新聞雜誌譬喻為「日常生活中的米糧」，是時人「文化生命」的主要來源，進而強調原料好壞的重要性，將導致健康而延年益壽，或病弱早夭甚至被毒害的差異。所謂「原料」指的就是媒體傳播的訊息與知識。他不但充分理解新時代傳播媒體對大眾的影響，更毫不留情批判當時站在統治者官方立場的媒體，是如何墮落而不稱職：

我臺從來雖有許多的金字招牌燦然的新聞雜誌，一看內容，好像一盤臭肉，盡是黴菌，不但不夠為我們文化生命的滋養料，恐怕還要受他的毒害呢。這樣敝害就是因為網羅一班不識時世的老學究的記者，和畏難苟安、貪名圖利的人們去經營，所以我臺的文化，直接間接受著這等人的阻碍，實屬不少。看且他們對於政府，不論是非曲直，只曉得替他造空氣、歌功頌德。對於資本家像製糖會社銀行或其他的，只曉得替他刊廣告文吹牛皮拍馬屁，以求吮啜一口弱者的膏血，其他如刻意搪塞，民生痛苦，則噤若寒蟬，是完全忘記了新聞雜誌的天職的。⁹⁴

他激烈批判當時新聞雜誌的內容，是感染黴菌的一盤臭肉，更怒責當時媒體充斥著「不識時世的老學究的記者，和畏難苟安、貪名圖利的人們」，指控他們扭曲事實，只知歌功頌德，不敢批判當政者與資本家，成為權勢者掌控台灣社會的幫兇。在一連串批判之後，他終於點出《臺灣民報》的理想與堅持：

我同人只曉得正誼公理勇往邁進，不怕權威、不知妥協，一意專心為社會啟發文化，為三百六十萬的同胞謀幸福而已。這樣奮鬥，我同人還

94 《臺灣民報》67號，大正14年（1925）8月26日，頁38-39。署名：蔡鐵生。

不敢自安，兩年前又加附刊「臺灣民報」，用極淺現⁹⁵的白話文字去普遍的宣傳，使之一般民眾容易覺醒，日多一日。社會的文化，也逐見漸漸向上。這就是我說文化上的糧食，能夠得到像「臺灣雜誌」「臺灣民報」那樣滋養豐富，纔可從病弱的身体恢復到健康的希望。⁹⁶

這裡他再度強調：《臺灣民報》以白話文字作為宣傳工具的原因，是為了推廣宣傳，便於民眾閱讀理解，而本文也正是他努力回應此一目標的具體實踐。有趣的是，全文之末，他附上一首詞作〈調高山流水〉，表達對《臺灣民報》在台灣民族運動陣營扮演關鍵角色的深刻期許，內容如下：

立言不朽本來難。況棲居、荊棘台灣。平等自由聲。何時響徹人間。關心處、故舊河山。潮流感。喚起青年雜誌。力挽汪瀾。筆尖嚴斧鉞。誅暴又鋤奸。

旬刊。操觚盡英俊。看滿紙、玉潤珠圓。還可喜鼎新革故。覺醒愚頑。⁹⁷萬人爭讀白文言。到今日。出世纔經五載。有補時艱。祝長生。遙呼萬歲唱民權。⁹⁸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萬人爭讀白文言」一語，「白文言」即指「白話文」。蔡惠如以古典詞的形式，表達對白話文能發揮普及功用的高度肯定，展現接納新時代來臨，必須以全新語言文體致力傳播啟蒙，觀念極為開通，意義深長。

上述之例顯示，雖然努力嘗試以白話體寫作，蔡惠如最熟悉擅長的，仍是以傳統文學的形式遣悶抒懷。1924年，為對抗辜顯榮等人發起「有力者大會」，7月3日林獻堂等人發起「無力者大會」加以對抗。不巧在大會前兩天，蔡惠如坐人力車意外跌倒，受傷骨折。無力者大會在台中舉行當天，林獻堂特

95 原文作「淺現」，應是「淺顯」之誤。

96 同註91。

97 筆者按：依「高山流水」詞譜，此處本應斷句為「還可喜鼎新，革故覺醒愚頑。」今依《臺灣民報》原刊斷句呈現，採用詞義作為斷句標準。

98 筆者按：依「高山流水」詞譜，此處本應斷句為「祝長生遙呼，萬歲唱民權。」今依《臺灣民報》原刊斷句呈現，採用詞義作為斷句標準。

別提到蔡惠如跌傷的意外，藉機諷刺日本當局，大會於是通過決議，指派林幼春、黃周兩人專程前往醫院慰問蔡惠如，已見前述。事後，櫟社社友陳槐庭、傅錫祺先後都寫〈醉落魄〉詞加以慰問。⁹⁹蔡惠如後來也特別回信道謝，並依韻回贈詞作一首，內容如下（見附錄圖5）：¹⁰⁰

錫祺社長大鑒：日前辱承惠贈好詞慰問，感銘不朽，初因骨傷微痛，心雜不清，未能及時奉和。茲經服藥調治，日漸見愈，苦痛已除，精神亦爽，乃於夜深人靜強索枯腸，仍依同調元韻，填成一闕，工拙不計，聊慰病中之苦悶，錄呈於後，望乞斧政，是所深幸。

革故應思設置，天心自古從民意。覆車折足全雙臂，造化推排，大作兒童戲。一生最愛多才智，恨無鴻鵠高飛翅。腳力翻雲，蹉跎尋常事。

澈心未是稿

這首詞內容展現蔡惠如一貫的豪氣，對意外受傷絲毫不以為意。相對於陳槐庭、傅錫祺的多用典故，蔡惠如之作平白如話。但起筆「革故應思設置，天心自古從民意」之句，更充分反映其不屈服的勇氣，與爭取被殖民者權益的嶄新思維，與前文引述之白話體文章理路一貫。

1923年12月16日「治警事件」爆發，至1925年入獄服刑前後，是蔡惠如一生中創作詩詞最多、最集中的階段已見前述。而櫟社雖是以詩文締交的文人結盟，並非政治社團，而且個別詩人的政治立場也未必一致，但詩友對林幼春、蔡惠如兩人為政治理想奔走而導致入獄，還是展現高度的關注與同情。1925年4月25日櫟社在霧峰林獻堂宅集會，當時林幼春、蔡惠如正在獄中服刑，本次詩會特別以「詩人、獄」、「迅雷」為題，作詩鐘與擊鉢吟詩。5月10日兩人

99 兩人詞作都發表在《台灣詩薈》9號（1924.10），頁563-564。陳槐庭署名「沁園」，傅錫祺署名「鶴亭」。陳槐庭作品內容是：「行遵大路，出門又觸韓盧怒，為公覆餗嗟奇數。兩犬能言，一夢纔驚寤。莫怨東林遭黨錮，重新炙輠無顛仆，健全腰腳應如故。既鑑前車，自此圖步安。」傅錫祺之作內容則是「重負雙肩引置，斷頭不介嚴顏意，折傷祇似羊公臂。小犬驕橫，莽作當車戲。懲前自衛如葵智，養真權戢凌雲翅，踢海當翻，一蹶渾閒事。」

100 蔡惠如致傅錫祺信函，由傅錫祺家屬提供。依「傅錫祺日記」，1924年7月3日所載：「蔡惠如君覆車傷足，函問其狀況。」7月11日又記載：「蔡惠如君覆車折足，陳槐庭君填醉落魄詞贈之，夜依其調亦填一闕。」由這兩則記事及信中所言，推估此信為1924年7月以後之信件。署名：澈心未是稿。

出獄後，櫟社特別在6月6日為他們舉行慰安會，展現該社對其政治理念之支持與詩友間深厚的情誼。

1928年10月20日，蔡惠如與櫟社詩友傅錫祺、林耀亭、陳槐庭、陳聯玉、蔡子昭、張棟樑等人，一同往霧峰參加林仲衡、林瑞騰嫡母楊太夫人八一壽宴。¹⁰¹ 1929年他去世後，櫟社友人陳貫在5月28日寫明信片給社長傅錫祺，曾回憶起這段往事說（參見附錄圖6）：

拜讀手教，備悉一切。鐵生竟歸道山，回想昔日君掌米穀公司之時，日相過從，情逾骨肉。近以從事於開墾及礦漁務，南船北馬，晤面不易。客臘會於霧峰，把酒話舊，累十觴亦不醉，¹⁰²孰知竟成最後之晤對耶！哀哉！¹⁰³

信中所說「昔日君掌米穀公司之時，日相過從，情逾骨肉」指的就是1910年前後在台中與櫟社好友的密切往來。接著說「客臘會於霧峰，把酒話舊，累十觴亦不醉」，則是指1928年10月20日櫟社詩友一起到霧峰參加林仲衡、林瑞騰嫡母楊太夫人81歲壽宴一事。字裡行間，不難看出詩友真摯的情誼，而從陳貫與蔡惠如唱和的詩詞〈一萼紅：寄南強鐵生獄中〉、〈念奴嬌：和鐵生獄中夜雨韻〉，也可見證相知之深，以及櫟社詩友對蔡惠如奉獻於抗日運動的肯定與推崇。¹⁰⁴

六、結語

蔡惠如原本是出身台中清水名門的富家子弟，1915年以前他以經營商業為生活重心，在台中致力事業投資，1915年以後因緣際會開始涉足政治活動，

101 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436-438。

102 此處所說「客臘會於霧峰，把酒話舊，累十觴亦不醉」，是指1928年10月20日櫟社詩友一起到霧峰參加林仲衡、林瑞騰嫡母楊太夫人81歲壽宴一事。參見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436-438。

103 傅錫祺收藏明信片，目前由其由孫女傅紅蓮女士收藏，並提供筆者參考，謹致謝忱。

104 陳貫有〈一萼紅：寄南強鐵生獄中〉、〈念奴嬌：和鐵生獄中夜雨韻〉，都是針對蔡惠如入獄事件所寫。

將事業轉往中國，但其關懷焦點已逐漸向政治領域移轉，因而造成事業曾幾度起落，逐漸走下坡。而其長年在日本、中國、台灣三地奔走往來，使他對世界局勢發展與時代思潮的掌握相當敏銳。1920年代，乃一躍成為台灣抗日民族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與林獻堂的沉穩內斂不同，其慷慨豪爽、熱血填膺的個性，一方面深具領袖氣質與領導魅力，一方面也容易樹敵，引來非議。¹⁰⁵ 論對台灣抗日運動的貢獻，其事功絕對不可磨滅。在文學創作上，他因治警事件入獄服刑所創作的詩詞，已然在台灣文學史留下燦爛奪目的一頁，而其詩詞文章所蘊含的啟蒙意識與進步思想，更是時代鮮明的見證。若不以成敗論英雄，他的一生，猶如一道劃過台灣夜空的流星，如此短暫，也如此絢爛。

論蔡惠如的個性，行動力強、熱情澎湃而富有感染力是其優點，但因衝動思慮不週而得罪人，可能也在所難免，他跟林獻堂、蔡培火感情並不親密，這是個性與價值觀的差異所致，因此蔡培火在私人日記中對他的為人與事功，有相當多負面的批評，也就不足為奇了。甚至他病逝前後，有相當戲劇化而令人難堪的情境出現，¹⁰⁶ 但他的喪禮卻相當隆重而備極哀榮，這一切都與他的個性特質有關。從此一角度而言，他的個性注定他必然成為一個悲劇人物。論他的思想與為人，在充滿凡人的弱點之餘，仍不失為鐵錚錚的漢子，筆者認為稱他為「悲劇英雄」並不為過。世間沒有完人，任何「偉人」都是因時代所需而被建構，蔡惠如當然不宜以「偉人」視之，卻是令人讚賞推崇、又令人嗟歎欷歔的台灣人。因此，本文在試圖勾勒蔡惠如波瀾起伏又戲劇化的一生之後，仍

105 蔡培火對蔡惠如死亡充滿複雜的情感，對其一生有相當負面的批評，他既感念與蔡惠如當年共同創辦《台灣青年》、為請願運動奔走奮鬥的革命情誼，但又稱他「論這個人是沒有什麼可取的地方」、「一生的事業無一項有成就」，見張炎憲編，《家世生平與交友》，《蔡培火全集》，頁94、95-96。而林獻堂與蔡惠如顯然也有過不愉快，林獻堂之弟林階堂，早年曾與蔡惠如共同投資事業，蔡惠如過世後，甚至不願包莫儀給家屬，兩人似乎曾有相當大的過節。參見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二）1929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12），頁149。

106 根據蔡培火日記，對蔡惠如臨終的情形有如下描述：「啊！惠哥的死實在真慘啦，他的了局實在可憐啦！聽見說他在福州腦出血已經好些了，不幸對他最寵愛的小姨懷疑與人私通到發狂！到氣斷以前，雖是講話不明瞭，時常罵那個小姨，他也時常拉着她，不讓她離開。啊！他一生的事業無一項有成就，卻也不能說是慘，甘願將家庭作犧牲，專心所得寵的小姨，對這個也這樣來了局，實在是慘至極點啦！……啊！我是不得肯講，懇朋友，你死得真慘啦！」見張炎憲總編輯，《蔡培火全集·第一冊·家世生平與交友》，頁94。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二）1929年》，頁149，也記載蔡培火對他轉述上述情形。

給予一定的肯定與敬意。

從文化層面觀察，蔡惠如從發起台灣文社，倡議創辦《臺灣文藝叢誌》，到以鉅資促成《臺灣青年》的創刊，使他在日治時期台灣文化與文學的啟蒙運動中適時扮演「開路先鋒」角色，其貢獻與慧見必須加以肯定。雖然他長年東奔西跑，除了因特殊情境而零星撰稿，並未實際投入這兩份刊物的經營與編輯，然而他卻在為數不多的詩詞、文章中展現了對漢族文化的堅持，以及貼近時代脈動的清晰啟蒙意識，可說相當難能可貴。而其思想從維護傳統到迎向現代的遞嬗軌跡，以及創作文體從文言到白話的演變，仍值得將他放在台灣文化史、文學史視野中作更深入完整的研究與辨析。

限於篇幅，本文只根據近年新發現史料，就蔡惠如的生平事蹟進行初步的挖掘探討，至於他的個性、思想與各種創作的深入分析，仍有待開展。目前新出現的各種史料所記載、描述的蔡惠如，都有助於鋪陳建構更細緻、完整的蔡惠如面貌，但其生平行蹤仍有許多不明之處，期待有心人士能針對這些新資料加以解讀分析，或進一步挖掘更多史料，從各種不同角度進行更全面的研究。



附錄一：蔡惠如相關原始史料（樂社題名錄、照片與相關書信）¹⁰⁷

樂社社友題名錄（以壽）	
陳基六	名錫金號鎮秋住台中大肚上堡牛罵頭街第九六番地
張慶俊	名三住台中大肚上堡牛罵頭街第四七九番地
王學潛	名元住台中大肚上堡牛罵頭街第三三番地
賴俱竟	名道運號住台中大肚上堡牛罵頭街第二二番地
林拱長	名道運號住台中大肚上堡牛罵頭街第二二番地
葉引昌	名道運號住台中大肚上堡牛罵頭街第二二番地
傅錫祺	名道運號住台中大肚上堡牛罵頭街第二二番地
陳湖	名道運號住台中大肚上堡牛罵頭街第二二番地
林俊堂	名道運號住台中大肚上堡牛罵頭街第二二番地
鄭玉田	名道運號住台中大肚上堡牛罵頭街第二二番地
張棟梁	名道運號住台中大肚上堡牛罵頭街第二二番地
陳懷澄	名道運號住台中大肚上堡牛罵頭街第二二番地
林仲衡	名道運號住台中大肚上堡牛罵頭街第二二番地
連雅堂	名道運號住台中大肚上堡牛罵頭街第二二番地
林子謹	名道運號住台中大肚上堡牛罵頭街第二二番地
呂福白	名道運號住台中大肚上堡牛罵頭街第二二番地
林幼春	名道運號住台中大肚上堡牛罵頭街第二二番地
莊高	名道運號住台中大肚上堡牛罵頭街第二二番地
蔡惠如	名道運號住台中大肚上堡牛罵頭街第二二番地
林獻堂	名道運號住台中大肚上堡牛罵頭街第二二番地
陳貫	名道運號住台中大肚上堡牛罵頭街第二二番地

圖1 明治45（1912）年的樂社題名錄，由社長傅錫祺整理抄寫保存，清楚記載包括蔡惠如在內的社員字號、住址、生年等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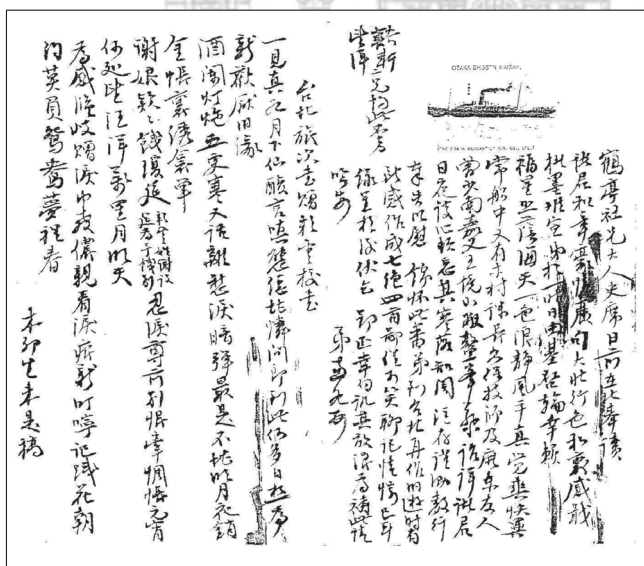


圖2 蔡惠如在赴日本船上，利用輪船提供的信紙寫給傅錫祺感謝錢別的信，並附有詩作〈台北旅次書贈彩雲校書〉七絕組詩四首，反映他當時並未脫離傳統仕紳階層喜流連風月的習氣，約1912年1月。

107 本附錄原始史料，除附錄圖4之外，其他均由傅錫祺孫女傅紅蓮女士提供，特此致謝。

鶴亭先生鈞鑒昨讀
 自示敬悉。以勸意替以現則實行校為妥況
 先生竟有同懷厚為慰。評議負概以鑑宜基
 成翁邦耆君二人。弟大贊成第不知獻其理此公亮
 見何如乞詞。為是家叔啟庚及家姑祥均皆承
 讓為持社負名許捐金又揚聲素心許。此
 探知加入持社負之社中為之註冊存此係以信
 人安
 弟謝
 十二月七日

圖3 蔡惠如寫信給傅錫祺，談及台灣文社的組織吸收成員加入，並積極募款，時間為1918年12月7日。



圖4 蔡惠如擔任「台灣文社」理事的照片，是現代西裝照、蝴蝶結，與左側陳槐庭的傳統中式長袍，恰成鮮明對照。照片上方註明他是「支那五國取引所專務理事」。見《臺灣文藝叢誌》第2年5號（19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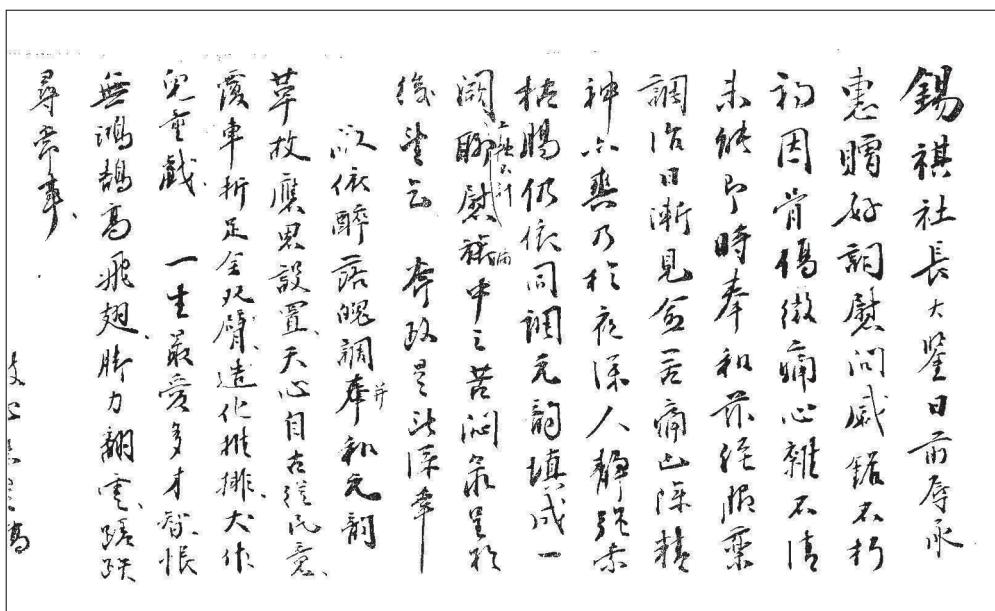


圖5 蔡惠如回信給傅錫祺，感謝慰問意外跌傷，並回贈詞作一闕，字體相當俊秀。時間約1924年7月以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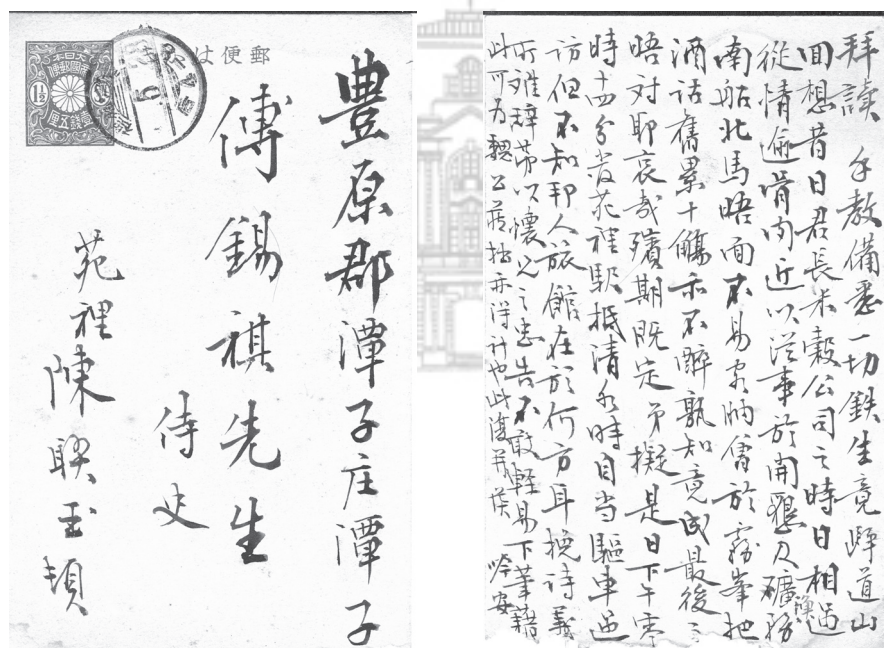


圖6 1929年5月28日，蔡惠如病逝後數日，櫟社社員陳賈寫給社長傅錫祺的明信片，追憶蔡惠如往年與櫟社友人的親密互動。

參考資料

一、未出版史料

「林癡仙日記」，手稿影本（林癡仙家屬林陳琅先生提供）。

「傅錫祺日記」，手稿影本（傅錫祺家屬傅紅蓮女士提供）。

「櫟社十週年大會擊鉢吟·大墩小集擊鉢吟」，霧峰林家頂厝捐贈手稿LIN003，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室收藏。

陳貫致傅錫祺明信片，1929年5月28日（傅錫祺家屬傅紅蓮女士提供）。

蔡惠如致傅錫祺信函三件，1912、1918、1924年（傅錫祺家屬傅紅蓮女士提供）。

櫟社題名錄，傅錫祺手抄，1912年（傅錫祺家屬傅紅蓮女士提供）。

二、專書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1923年》，（台北：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2012.12）。

王詩琅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新北：稻鄉出版社，1988.05）。

白慈飄，《啟門人——蔡惠如傳》（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77.10）。

呂敦禮，《厚菴遺草》，（台北：龍文出版社，「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三輯，2001.06）。

東海大學中文系主編，《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學論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2003.02）。

林幼春，《南強詩集》（台中：中台印刷廠，1964.02）。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台北：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0-2001）。

婁子匡、王詩琅集輯，《台灣青年》複印本（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73）。

———，《青年》複印本（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73）。

張炎憲總編輯，《蔡培火全集》（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0.12）。

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

許俊雅主編，《台灣古典文學評論合集》（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4.11）。

———，《黑暗中的追尋——櫟社研究》（中國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06）。

連橫，《台灣詩薈》（台北：台灣詩薈發行所，1924-1925）。

- 郭嗣芬等，《台灣先賢先烈專輯·第三輯》（南投：台灣省文獻會出版，1978.06）。
- 陳逢源，《溪山煙雨樓詩存》（台北：龍文出版社，1992.03）。
- 傅錫祺，《櫟社四十年沿革志略》（台北：興南新聞社，1943.06）。
- 葉榮鐘，《台灣人物群像》（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95.04）。
- ，〈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台中：晨星出版公司，2000.08）。
- 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三）·追思錄》（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複印本，2005.12）。
- 廖振富，《櫟社研究新論》（台北：國立編譯館，2006.03）。
- ，〈台灣古典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晚清到二二八〉（台北：國立編譯館，2007.07）。
- 鄭汝南、蔡子昭等編，《臺灣文藝叢誌》（台中：台灣文社，1919-1924）。
- 謝金蓉編，《蔡惠如和他的時代》（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06）。

三、學位論文

- 王建國，〈百年牢騷：臺灣政治監獄文學研究〉（台南：成功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
- 林佳蕙，〈日治時期臺灣「監獄文學」探析——以林幼春、蔡惠如、楊華作品為例〉（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4）。
- 許薰文，〈日治時期櫟社四家詞析論——林癡仙、陳貫、陳懷澄、蔡惠如〉（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2009）。
- 黃文成，〈受刑與書寫——臺灣監獄文學考察（1895-2005）〉（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5）。
- 廖怡超，〈日治初期臺灣「斷髮」現象研究——以《台灣日日新報》為主要範圍〉（台中：中興大學台灣文學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9）。
- 廖振富，〈櫟社三家詩研究——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1996）。

四、電子媒體

- 大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來源：
<http://140.120.81.240/ddnc/ttswebx?@0:0:1:ttsddn@@0.7471459490363714#J>

UMPOINT，2013.09.09）。

大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所附「《臺灣民報》」」（來源：<http://140.120.81.240/ddnc/ttswebx?@0:0:1:ttsddn@@0.7471459490363714#JUMPOINT>，2013.09.09）。

台灣大學，「臺灣日治時期統計資料庫」（來源：http://tcsd.lib.ntu.edu.tw/main_search.php，2013.09.09）。

